

汉字文化的理论探索

——评苏新春主编的《汉字文化引论》

余 延

汉字的文化研究在当今已发展为横跨汉字学与文化学这两门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国内出版的关于汉字文化研究的著作不下十余种,有的著作对汉字文化的研究已达到一定的深度。但是,从整体情况看,着眼于宏观描述的多,重视微观挖掘的少;就某一角度出发得多,多角度综合考察的少;因袭成说的多,提出理论体系的少;耽于浮泛之论的多,独具只眼的少。而某些具有本质性的基础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清理。汉字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关系以及将来的命运,也没有从事实上和理论上提出有力的论证。汉字与汉民族社会、历史、风俗、文化、语言、思维等方面的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机制,也还缺乏深层的揭示和理论阐发。因此,汉字文化研究工作的进步和发展,基础理论的建设是当务之急。

有的学者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了苏新春教授主编的《汉字文化引论》,这部由广州的四位语言文字学者共同撰写的学术著作的问世,表明汉字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已被作为重要的学术议题而提上日程。这一学术动态的实质是:对已往汉字研究工作的反思和对汉字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已成为反映当代汉语研究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标志,汉字在世纪之交的重新研究正酝酿着新的突破。在这场跨世纪的学术变革中,苏教授主编的《汉字文化引论》,对汉字文化基础理论的建设,起到了开创性的引导作用。

这部著作的贡献首先是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基础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摒弃了把汉字看作是一个单纯的记录符号的观点,而把它看作是与深厚的汉民族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并融会于其中的一种文化产物”(见绪论),在这个基本观点指导下,汉字与汉民族社会的联系,汉字与汉民族精神世界的联系,汉字与汉语互为表里的依存关系,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研究汉字文化的基本理论体系。传统的汉字学家从字形分析字义,联系社会历史背景来探求汉字的造字理据,这并不是什么希奇的事。但当学者们从这种单个字形字义的考求中走出来,把汉字变成窥探社会历史情形的研究对象时,这一转变就获得了文化学的特殊价值。这是此书作者以汉民族社会历史作为基本因素构建汉字文化理论体系的主要依据。应当指出,并不是任何一种文字都可以通过字形的研究发现它的文化学意义。世界现存的各种文字中,只有汉字以其特殊的性质和恒久的文化积累,才够得上作为文化学特别关注的对象。作者正是紧紧抓住了汉字这一本质性的特征,使此书提出的汉字文化理论一开始就建立在十分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之上,从而使这一理论因具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和科学价值而显得生机勃勃。汉字与汉民族精神世界的相互联系,是在汉字与社会历史关系基础上更深一层的探索。作者从认知理论与信息论的角度指出:“文字性质、功能的差异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说来,是通过认识有重大作用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框架体现出来的,它们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作用是深层次的、潜意识的、极其深刻而巨大的”(44页)。从这一具有强大穿透力的精辟见解出发,作者把汉民族的认

知模式、思维方式和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特征,以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以汉字为中心有机地组合为一个彼此依存,相互作用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任一因素的变化发展,无不从其他因素反映出来。汉民族精神世界的运动变化促进了汉字的变化发展;汉字的变化发展,反过来反映了汉民族精神世界的丰富内涵。但是,“从汉字所表达的对象来看,从汉字所发挥的交流功能来看,最终影响汉字的存在和使用的仍是汉语。在后来的汉民族文化发育和文化生态环境中,汉语成为影响着汉字的一种最重要的因素”(108页)。这一段精采的论述恰到好处地揭示了汉字与汉语的血肉联系,在与汉字相关的所有因素中,汉语的存在和发展,是汉字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此书以整整三章的篇幅详细论证了汉字与汉语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的深层机制,同时也分析了两者产生异化的原因。作者认为,“由于汉字与汉语是两套相互依存的表达交际系统。一方面它们互为表里,交互扭合在一起,为了共同的交际目的,在共同的动力驱动下,发挥出共同的功能;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载体,作用于人们的感官、发挥功能的途径也完全不同。这种特定的关系就决定了在它们二者之间必定会表现出一种‘背离’与‘互补’的特点”(168—169页)。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为汉字与汉语完全吻合,毫无矛盾的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切合现况;认为汉字与汉语互不相干,可以各行其是观点,更是人为地割断了两者之间的血肉联系,为汉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设置了障碍。此书以大量事实阐明的理论原则,不仅证明了以上两种看法的片面性,而且使人们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盛行、至今仍未绝迹的,“希冀用别的什么符号来代替汉字的理论和行动”(110页)所表现的混沌疑惑转变为清醒的理论评价。因此,此书提出的这一基础理论框架不啻为汉字文化学的理论建设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在当今汉字发展的十字路口,这一理论起着方向性的引导作用;对于汉字和汉语研究新领域的继续开拓,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此书的另一贡献是对19世纪末以来的汉字改革运动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刻剖析。无论研究汉字还是汉语,对这一长达百年之久并延续至今的文化运动的反思都是不容回避的课题。对这一课题作出的答案关系到汉字的命运和前途。在当前还有不少学者对汉字和汉语抱有成见的情况下,对这一论题敢于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是需要勇气的。作者客观地回顾了百年来的汉字改革史,肯定它“在观念的开放、教育的普及、文化的推进、语言的统一、文字的规范、对外文化科技的交流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但由于在对汉字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上存在着偏离,从而在实践和理论上,都给汉字的稳定与使用带来了程度不小的混乱和损失”(243页)。迅速纠正对汉字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上存在的偏离,尽快弥补由此造成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失误,是汉字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而从理论上澄清长期存在的糊涂观念更属燃眉之急。作者以非凡的学术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将汉字与语言本属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掺合在一起,将客观性学术性很强的文字问题与社会变革的政治问题掺合在一起,将历史悠久的汉字与保守落后的旧社会制度等同起来,将拼音文字与西方的先进科技等同起来”(243页),这就是汉字落后论产生的理论根源。作者以翔实的材料和缜密的分析,侧重对汉字社会属性认识的错误,对汉字功能评价的失误,对汉字价值观的偏颇、对汉字性质鉴定的纷歧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汉字作为汉民族社会的交流工具并不为特定的阶级服务,把汉字当作特定阶级使用的工具,与落后的社会制度捆绑在一起,进而把社会生产力滞后的原因归咎于汉字,既违反科学原理,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否认汉字形音义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否定汉字的表意功能,势必得出西方文字优越的结论,但是,汉字电脑输入速度超过英语,且普及到中国社会的千家万户,这一事实表明现行的关于汉字功能和价值的理论需要从根

本上重新建构。汉字性质的探讨是一个在短期内还很难统一认识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在详细分析各家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诚如作者所言:“汉字性质的讨论本是一个纯学术性的理论研究,可是在当时它却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汉字拼音化的理论基础,为汉字描绘了完全不同于前一时时期所描绘出的身形和神采,汉字具有了不同于前的身价与地位”(280页)。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此书还把汉字放在世界文字格局中进行了比较研究,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汉字的特色与价值。作者通过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为汉字文化大厦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它在汉字研究史上具有别开生面的开拓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此书在章节结构以及内容的安排上还可以斟酌。例如,有关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比较似可以放在绪论部分或第一章,而有关汉字电脑输入的内容也可以放在最后一章讨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全书的研究重心更为集中紧凑,避免结构的松散。全书除第一章以显著篇幅讨论汉字的性质外,第六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一节,第十一章第五节都以不少篇幅讨论汉字的性质,这就难免有枝蔓重复之感。对于汉字体系,不只是可以西方文字为参照系。应当考虑到,汉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汉字对日本文、越南文、朝鲜文的影响是举世公认的。在中国境内,纳西族文字、水族文字、彝族文字与汉字的比较研究,也是汉字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作为引论性的著作当然不可能要求包罗万象,面面俱到,这里仅是从进一步推动汉字文化研究工作出发,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的一点建议而已。

(通讯地址:361005 厦门大学中文系)

(上接第24页)文。若加以区分,本阶段还可以分成“古汉字”和“今字”两个时期,“隶变”是他们的分水岭,他也是汉字在第三阶段中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内部改革,并由此奠定了今天汉字的基本面貌。

有了以上三个阶段的假说,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现成各种有关汉字形成、起源的理论和说法,并进一步讨论汉字的性质了。

四、汉字的性质

汉字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体系,考虑到他的形成历史的久远和成型之后的重大变迁,汉字应该是有多个层级的符号体系,与印欧语系的文字符号相比,汉字符号体系不是线性的,而是立体的,他总是以有限的单位空间容纳大量的信息为主要表征的。因而形成了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的历史形态,这是汉字符号的根本性质所在。

由于汉字符号体系是特殊的层级体系,他与汉语的天然联系就不像印欧系语言中文字符号和语言的联系那么紧密,而是具有一定空间的。换句话说,汉字不仅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他还是承载华夏文明的媒体,不但能标示语言,而且具备一定的制约语言的机制。这就是汉字的形、义之间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深层次原因。

既然汉字是复杂的层级体系,我们在讨论汉字性质的时候就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遇到的问题,而应该开拓新的视野。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但能够对第一、第二阶段的汉字符号体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在局限于“是否记录语言”的旧框框之中,而能在理论上有一个大的突破。而且,能够对第三阶段汉字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给出比较圆满的解释。

(通讯地址:266071 青岛海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